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

● 冯恩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系列学术著作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

冯 恩 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 / 冯恩学 .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601-2769-X

I. 俄... II. 冯... III. 考古—概况—俄罗斯
IV. K885.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79728号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
冯恩学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黄凤新

封面设计: 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3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25 插页: 1
字数: 461 千字

2002 年11月第1版
2002 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5601-2769-X/K · 81

定价: 30.00 元

序

看到冯恩学花了将近三年时间写成的《俄国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心潮激荡，久久难平。

首先，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喜事。

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从那时候起就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从来只有外国人到中国来考古，中国人（除到外国去学考古学）是不到外国去考古的。外国人出版了大量的有关中国考古的论著，而中国人则基本上是不研究外国考古的。这里和日本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近年来日本同成社陆续出版了一套新的“世界考古学”，其中除《中国考古学》外，有《朝鲜考古学》、《东北亚考古学》、《西亚考古学》、《东南亚考古学》、《中央欧亚大陆考古学》、《埃及考古学》、《中美洲考古学》等等，是由对这些地区有专门研究的日本学者分别撰写的。而中国过去则只翻译过吉谢廖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弗鲁姆金的《苏联中亚考古》、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朝鲜考古学概要》等外国人写的书，还都是内部发行的。后来张光直先生建议文物出版社出一套世界考古名著的中译本，1990年出了一本《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杨建华译），就再没有下文了。1999年才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包括苏美尔、希腊、玛雅、埃及和印度），仍然都是外国人写的书。只要把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由中国学者写的有关外国考古的辞条，和日本早就出版的《世界考古学事典》中的辞条，在数量上和内容上略作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

考古界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日本。因此，当1992年底我看到杨建华写成的《两河流域史前时代》这本作为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外国考古专题研究的书时，令我兴奋不已。现在，冯恩学写的这部书，地理面积有七百多万平方公里，起自旧石器时代，一直写到明代。对这样时空范围内的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成果作出了较全面的介绍，还有自己的见解和评论，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本对世界考古的区域性概论著作，怎么不是破天荒的大喜事呢？

1989年，苏秉琦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开幕词中说：“我认为今后的十年，需要我们认清形势，明确方向，突破重点，做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业绩。”他解释说：“所谓认清形势，就是走向世界。不主动，就是被动，世界近代史不乏先例。与其被动做世界二等公民，不如主动做这个星球的合格公民。权在自己，好自为之。所谓明确方向，就是摆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指出：“当前的现实是，我们研究世界的人，远不如世界研究中国的人多。”“祖先没责任，要反躬自省。借用一句台词叫‘慧根就在脚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苏先生又多次强调了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主张要从用区系的观点看中国，发展到用区系的观点看世界，“从而以‘世界’的观点认识中国，即‘世界中的中国’和重建中国史。”（《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东南文化》1993年1期）

苏先生指出：“‘区系的中国’是方法论，‘世界的中国’也是方法论。从前者到后者，在思想认识上要有个大的转变，中国考古学要上升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家要上升为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转变、认识上的提高问题，而是要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诸方面采取若干切实可行的、持之以恒的重大措施、步骤，以开拓新局面

的问题。其具体内容，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学科体系首先是要‘上下理顺’，如旧石器考古与新石器考古再不应各搞各的，关系要理顺。

(二) 内陆与边疆考古要均衡发展，重点把边疆考古单列项目，不论学科体系还是人才培养计划都一样。

(三) 中国考古学与外国考古学要并重，重在把外国考古学要单列项目，包括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7日）。

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了，苏先生说的这些话，仍然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考古学工作者们如果不再看清形势，努力地“走向世界”，又怎么可能以世界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即“世界的中国”呢？记得曾有一人写了一篇《夏文化北播及其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文中说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的球形陶罐起源于中国二里头文化的圜底陶罐，卡拉苏克文化的短剑起源于二里头文化的戈，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刀和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刀相似，由此证明匈奴为夏人的后裔。我想，如果是在一个比较普及了世界考古基本知识的国家里，如此牵强附会的“论证”，是不会被认真看待的；但这篇文章居然被权威的史学期刊《历史研究》1997年4期刊用，《新华文摘》又马上转载。这正好说明，如果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历史学家还只注视着本国的历史，而不去了解周围世界的历史（特别是考古发现所不断提供的新的历史知识），就不可能认识本国历史的真相。像在匈奴问题上，就会笃信司马迁说的“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用一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考古知识去曲意比附。这样的文章当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仍可以哗众取宠，但毕竟不能在世界上免遭“二等公民”之讥。

当然，中国考古学要“走向世界”，不可能一蹴而就。苏先生说的“权在自己，好自为之”是语重心长的。这需要有一

批人坚持不懈地甚至是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像《俄国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这本书的内容，是冯恩学在接任我曾经开过的“西伯利亚考古概论”这门课后，多年积累起来的。我当初对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的了解，也就是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写的那些辞条的水平。冯恩学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和东北考古有最密切关系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后，便大大地深入了一步。例如我当初对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沿用奥克拉德尼科夫在1950年的《贝加尔湖沿岸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I~II分册）》的旧说。而冯恩学在接课后，就介绍了格拉西莫夫主张伊萨科沃期和谢洛沃期应为同一个文化，基多伊期是另一种外来文化的观点。又根据他看到的1976年出版的书，把谢洛沃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又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没有远东地区青铜时代的辞条，冯恩学根据1987年出版的《苏联森林地带的青铜时代》一书，补充了青树林文化、马尔加里托夫卡文化、利多夫卡文化等。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所以我看他写的这本书，感到学习到了许多全新的知识，真是得益不浅。同时也深深感到，考古学作为一门不断进行着新的实践和实验室鉴测的学科，其发现和研究成果是日新月异的。必须不断有人关注、跟踪，才能跟上它的发展脚步。这就不不但要有专人，而且应该有队伍，也就是苏先生说的要有计划培养人才才行。

现代中国考古学基本上是在中国境内的田野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考古学家，大多数是有丰富的实际考古经验的。对有志于“走向世界”的人，就有一种非难：他又没有到外国去考过古，写什么外国考古的书。这话固然有道理，但对当前中国考古学界的实际来说，恐怕并不能先派人到外国去搞考古，再写外国考古的书。倒是应该有人先写出外国考古的书，以应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之急需。要不然，对外国的

考古两眼一抹黑，又怎么上外国去考古呢？当然，自己能看外国的考古著作那是最理想的了。可惜，中文的考古著作也不是中国人都能看懂的，何况中国考古界目前外文水平普遍来说还不高，更何况就中国邻境的国度来说，像朝文、蒙文、俄文都是考古界眼下极少有人懂的语种。所以我想眼下一定要有冯恩学这样的有志者，甘愿受没到外国考过古的非难而写外国考古的书，肯于孜孜不倦地做开拓生荒的工作，才能使中国考古学的“走向世界”迈出坚实的步子。我真希望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继此书之后陆续出现中国人写的《日本考古学》、《朝鲜考古学》、《蒙古考古学》、《西西伯利亚考古学》、《中亚考古学》等等，这样才不辜负苏先生在世时对我们的谆谆嘱托。

其次，我还想谈谈这本书。

冯恩学写这本书不只是介绍俄国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许多地方都结合中国（主要是东北）和其他邻近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对照中国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资料，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

我在这里不想对冯恩学提出的许多不同于俄国考古学家的见解一一评论，因为我自问在他所讨论的问题上并不比他有更多的发言权。我希望这本书出版之后，他所提出的种种见解首先会在中国考古同行中开展讨论。我在这里只谈看了这本书的主要感想：第一，苏先生说的要从区系的观点看中国，走向用区系的观点看世界，用世界的观点看中国，这是非常正确的。第二，当中国考古学家走向世界时，不但会扩大自己的眼界，在用中国的观点看世界时，对世界考古学也会有自己的贡献。

我先举例来说明第一点。苏秉琦先生 1975 年 8 月在北京给吉林大学师生做关于区系类型问题的报告时。把中国全境划为六大区系，其中“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是属于面向欧亚大陆腹地的三大区之一。后来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

祀遗址，于是才有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这样的提法。而当时考古界关注的是北方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相似性和相互关系。实际上，随着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不断开展，而且把视野进一步拓展到邻境地区，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东北及其邻境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平底筒形罐的文化区，其面积大大超过以陕晋豫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看，俄国的考古学家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已经形成一种观点，东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盛行圜底陶器，而远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则盛行平底陶器，是两个不同的大文化区。如果我国早就借鉴这种分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东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恐怕在 1972 年新开流发掘和 1973 年新乐发掘后，就会意识到东北平底筒形罐分布区的存在，自然会考虑红山文化也应划归“东北地区”而不宜归入“北方地区”了。现在任何一个赞成用区系的观点来研究考古文化的人，看了这本书对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全面介绍，都一定会同意冯恩学的结论：“新石器时代远东南部与我国东北同属于一个大的平底筒形罐文化区”，从而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并不是只有“面向欧亚大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文化系统，实际在东北地区还存在着另一个大的文化系统。至于东西伯利亚还有一个很广大的圜底陶罐的分布区，它的东缘是否伸入到嫩江平原，恐怕要等到黑龙江省西部和呼伦贝尔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有更大进展后，才可以做出明确的结论。由此可见，从世界看中国才能更清醒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文化现象。

再举例来说明第二点，黑龙江下游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螺旋纹很发达，奥克拉德尼科夫本来是很注意俄国远东古文化和中国古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曾主张这种螺旋纹可能起源于仰韶文化，以锦西沙锅屯遗址为中介，传到黑龙江（《远东各族

文化的渊源》，《古代文化寻踪——从伏尔加到太平洋》，1954年）。他后来主张俄国远东地区的“文化主权”和文化独立性，就反过来说黑龙江的螺旋纹是起源于当地神话传说中的巨蛇，螺旋纹“在中国艺术中不是基本因素”，“与原始农人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远东考古的新发现》，《远东问题》1972年3期）。其实，原先的推测和后来的武断，都表明他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具体了解是不多的。冯恩学在本书中，根据中国和俄国远东地区的实际考古新发现，勾画了大汶口文化彩陶的钩连螺旋纹伴随陶壶传到了辽东半岛（小珠山中层），又沿鸭绿江进入图们江流域（西浦项Ⅲ期层），再经俄国滨海南部传到黑龙江下游的具体传播路线，证据充足，确然可信。可见中国考古学者对俄国考古问题也是很有发言权的。

再举一个例子，奥克拉德尼克夫在1959年出版的《希什基诺岩画——贝加尔湖沿岸的古代文化遗存》一书中，把中世纪岩画分为两个组，其中有游牧车帐的一组，他认为是游牧的蒙古人中的塔塔尔部所遗留。冯恩学在攻读博士期间对辽墓壁画下过功夫。所以看到这些岩画就和辽墓壁画进行对照，便发现了这些岩画有明显的辽代契丹文化的特点。以此为基点，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这些岩画应属辽代有名的羽厥里部的遗存。姑不论他对历史族团的考证是不是一定对，他利用写实而描绘细致入微的辽墓壁画来诠释简略而抽象的岩画所表现的事物和场景，无疑是开创了一条可取的路子。也可见中国考古学者在走向世界时自有其独具慧眼之处。

我举这几个例子，并不是要说冯恩学有过人的学识或天资，而是想说明，我们只要真的理解苏先生“‘世界的中国’也是方法论”的教导，把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当作新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一定会有大批的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在实践中大开眼界，大长学问，更快地磨练自己的聪明才

智，在把中国的考古事业推向新的高度的过程中，涌现出苏先生所企盼的“世界的中国考古学家”。

最后，我要再谈谈冯恩学。

冯恩学是农民的儿子，全然没有什么家学渊源，我看上他爱钻研，有主见，而且中学学过俄语，1987年辅导他写了一篇题为《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的本科生毕业论文，所涉及的地域达到苏联远东地区，这大概是他接触俄文考古文献的开始。接着他成为我指导的东北考古硕士研究生，很努力地学习俄语，毕业论文是研究北方式铜釜的，他把中国出的这种铜釜和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广泛分布的铜釜作全面的综合比较，所以很有发明，受到刘观民先生的高度赞扬。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就留校任教了。

在留校工作后，他有两件事使我印象至深：

一件事是学校当时住房特别紧张，我这个系主任又很无能，只给这位新留校而又新婚的青年教师，弄到一间由浴室改成的居室。只有门而没有窗，白天也得点灯，关上门就一点不通风。一停电就没有一点亮。但冯恩学自己说服了爱人，当年下半年就带领考古班学生到赤峰西道村点将台工地去实习了。不仅在这个工地尽心尽力的指导学生实习，而且结合指导学生的实际感受，回到学校的半年时间里，就在那样艰难的居室条件下，写出了油印教材《探方发掘》（后来在朱永刚、陈全家、李言等人帮助下，他本人又进一步加工完善，1992年以《田野考古学》的书名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我曾在香港的书店里见到此书），1991年下半年就再去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带领学生实习。说实在的，我在接到那份油印教材时，是极为感动的。既因为他对考古教学工作的一片热忱，也因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份胆量。因为吉大考古专业田野工作已经有一定的名气，由一名刚参加工作的助教来写教材，那是要多大

的勇气啊。

另一件事是1992年他考取我的东北考古博士生后，我从系里学科发展的长远规划考虑，希望他能从他搞过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改搞宋辽金元考古，而以研究辽墓作为切入点。他并没有讲什么价钱就同意了，把我借给他的一部中华书局校点本《辽史》带走，并开始收集辽墓的资料。后来当他自己买了一部《辽史》，把我的那部还给我时。封面已经变色，页角已卷起来，看来是翻过很多遍了。而且在接触辽墓资料后不久，就敏锐地看出过去把一座元墓定为辽墓的错误。不过，因为我自己对辽墓也非专长，指导当然不很得力，致使他论文的初稿并没有得到宿白先生的首肯。他也没有灰心，又花了一年时间通盘重写。比如在鸡冠壶的基本类型和演变序列、在契丹式墓和汉式墓的区分等方面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新见解。而且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承担了本科生的宋辽金元考古课。应该说，如果没有冯恩学在对他有关键意义的攻博期间毅然改搞辽墓，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的宋辽金元考古就会没有人教了。后来，在教学改革的探索中，曾经把中国考古学的课程改为“旧石器考古”、“先秦考古”、“汉唐宋元考古”三大段。在分配主讲第三大段课的几名教师中，只有冯恩学一面担任三峡考古的实习领队工作和发掘报告的撰写，一面把这一大段的讲义通盘写了出来，并配以全套幻灯片。像他这样把系里的教学需要放在第一位，按考古专业总体发展的要求来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无疑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也许，正是冯恩学这样的人，才会写《俄国东西伯利亚和远东考古》这样的书。其实，他的俄语并不是很好，要基本上是用俄文资料来写这样规模的一本教科书，不知要比写一本中国考古学方面的教科书难多少倍。但是为了教学上的需要和进一步开展东北考古研究的需要，他便来做这一件很吃力而难讨

好的事。中国的考古学科体系直到现在还没有像苏先生期望的那样“上下理顺”，搞旧石器的和搞新石器的还是隔行如隔山。冯恩学作为一个主要搞宋辽金元考古的人，在这本书里用大约六分之一的篇幅写的是旧石器时代，恐怕在中国考古学界就找不出几个人愿意干这种“傻”事。但是在外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考古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份额，俄国也不例外。如果为了“藏拙”而不写旧石器时代或写得很简略，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原意了。我想，在冯恩学写这本书时一定有很多他人未体会过的苦衷，但也一定获得了大多数人未得到过的乐趣。要知道，就是中国人写的中国考古学教科书，也是一个人只写一个时代，或一个时代的某一部分。而冯恩学写这本书，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达明代，不同时代的考古要牵涉不同的相关学科，还要对不同时代的中国边疆考古的材料和朝鲜、日本、蒙古的考古材料进行比较，还要和各个时代的文献记载联系，还要和大量的民族学资料比较。我想，有勇气而又认真踏实地去干这样的“傻”事的人，一定是会有很多人不可能得到的收益的。尽管这本书一定会被各方面的专家看出许多稚拙甚至是谬误之处，但我相信，不但是考古专业的青年学生，还有许多考古界的同行，其他相关学科的同行们都会热烈地欢迎这本书的出版。给他在颇有些悲凉意味的学术道路上增添更多的勇气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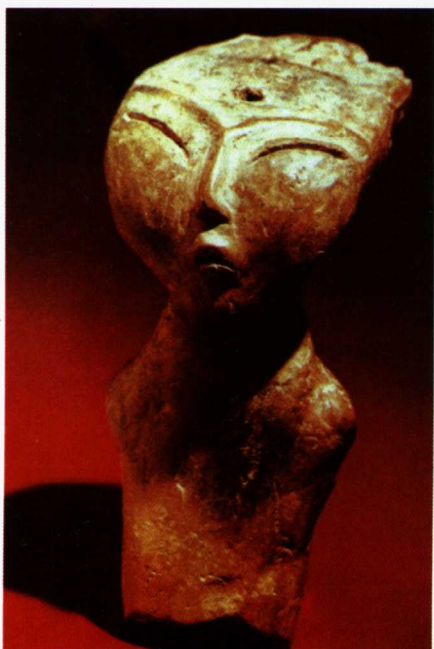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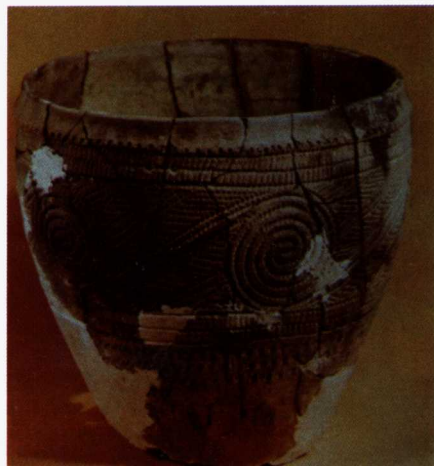
我希望这本书问世后，能在广泛接受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和作者的补充修改后，再出一本更好的修订本。

我祝愿本书的作者在他已经选定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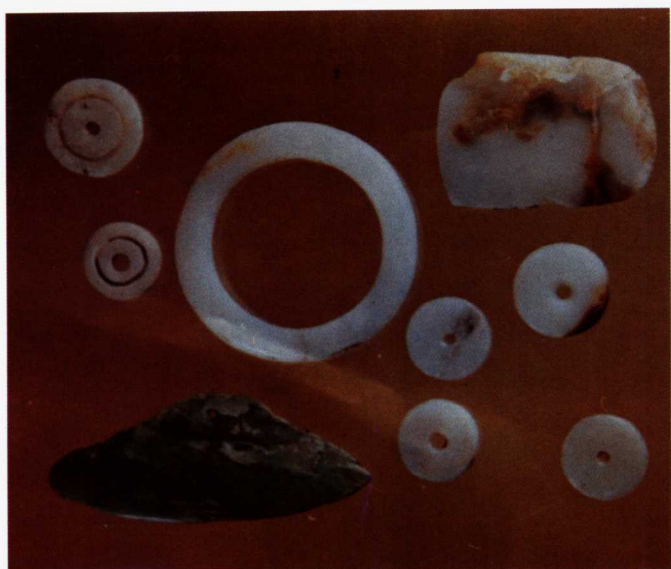
林 沅

2001年7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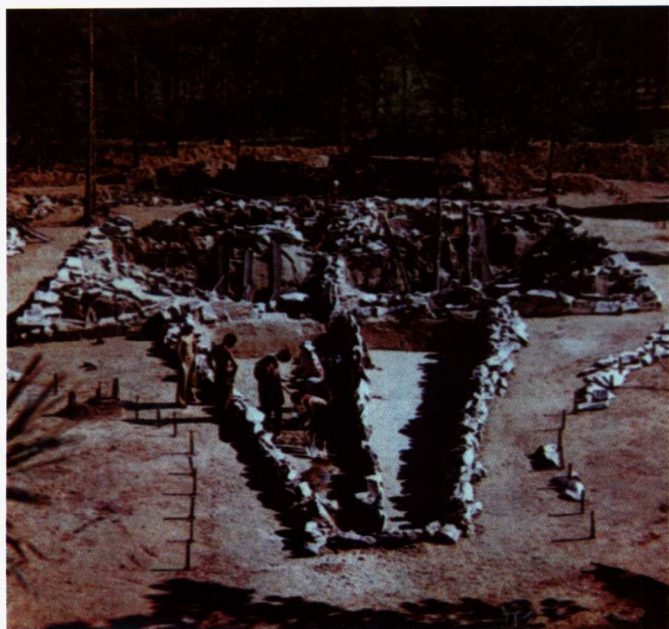
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一、黑龙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陶制品
左：沃兹涅谢诺夫卡 右上：苏丘岛 右下：孔东



二、贝加尔湖奥利洪岛出土的格拉兹科沃文化玉器



三、外贝加尔伊利姆谷第54号匈奴墓发掘现场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旧石器时代考古	(1)
第一节 安加拉河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2)
一、马尔他遗址	(3)
二、布列齐遗址	(14)
三、科瓦河口遗址	(16)
四、白河河口遗址	(20)
五、马尔他文化反映的人类在物质文化上的 巨大成就	(21)
六、马尔他文化的原始宗教	(25)
第二节 外贝加尔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40)
一、主要遗址	(40)
二、文化特点	(51)
第三节 雅库特的旧石器时代考古	(53)
一、基林格遗址	(54)
二、久克泰洞穴遗址	(54)
三、伊希涅遗址	(57)
四、米利河口遗址	(59)
五、苏姆那金遗址	(60)
六、别里卡奇遗址	(60)
七、别列廖赫遗址	(64)

八、文化性质与年代	(65)
第四节 远东旧石器时代考古	(67)
一、远东南部的旧石器时代	(68)
二、远东北部的旧石器时代	(82)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考古	(93)
第一节 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94)
一、贝加尔湖沿岸新石器时代研究概况	(95)
二、欣谷墓葬	(98)
三、伊萨科沃文化	(99)
四、谢洛沃文化	(107)
五、基托伊文化	(130)
六、多层遗址	(142)
七、原始宗教的发展	(144)
第二节 安加拉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146)
一、科瓦河口遗址	(147)
二、恰多别茨遗址	(149)
三、帕尔塔遗址	(153)
四、帕什诺遗址	(158)
五、埃杜昌季遗址	(161)
六、帕达尔马遗址	(163)
第三节 外贝加尔的新石器时代考古	(165)
一、钦丹特遗址	(165)
二、马尔杜伊遗址	(169)
三、斯图坚特遗址	(170)
四、诺日湖墓地	(171)
五、阿伦·扎尔加遗址	(176)
六、阿伦·扎尔加墓葬	(180)